

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

——以 1884—1949 年间新疆地区的教育为例

刘超建

(广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1)

摘要: 自新疆改建行省至 1949 年间, 新疆地区传统的经文教育经历了义塾的兴办、新经文学校及民族文化促进会办学校的三次冲击, 实现了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在转变的过程中, 政府解决了毕业生就业、校址选择、课程设置以及专职教师培训等几个关键问题, 并逐步实现了各民族学童走出封闭的经文教育世界。

关键词: 1884—1949 年; 经文教育; 近代化教育; 新疆地区; 教育转变

中图分类号: G75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639 (2018) 04-0061-08

DOI: 10.14091/j.cnki.kmxyxb.2018.04.010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Scripture Education to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Taking the Ethnic Education in Xinjiang Region as an Example

LIU Chaojian

(History, Culture and Tourism School,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China 541001)

Abstract: The education in Xinjiang region had achiev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scripture education to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after it experienced three shocks during 1884 to 1949, including private schools, new schools with teaching of scriptures and the schools sponsored by the promoting ethnic culture association respectively. In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the government had resolved several key problems such as employment of graduates, selection of the location for schools, the curriculum and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teachers and so on, and gradually realized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confined scripture education for the school-age children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Key words: 1884-1949; Scripture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education; Xinjiang region;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一、新疆建省前的教育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勘定新疆,由于清政府在新疆地区实行了严格的民族隔离政策,汉语教育仅在乌鲁木齐地区得以兴办,其他地区则以传统经文教育为主。经文教育校址多设置在清真寺,学生多少不一,大寺40人左右,中等寺10余人,

小寺不过数人之多。当然也有百余人的经文学校,但为数甚少。^{[1]136-137}学生数量,除受寺院的大小影响外,阿訇的学识与知名度也是重要因素。因为经文学校没有固定的教材,以诵读《古兰经》与《圣训》为主要内容,阿訇通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进行讲授。对于大多数的学生来说,他们读经文学校的主要目的是可以成为宗教的接班人,如阿訇、

收稿日期: 2018-06-07

基金项目: 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1884—1949年间乌鲁木齐地区村官研究”(2016GXT57); 广西师范大学博士科学研究启动基金项目“乌鲁木齐地区的民团、商团与自卫团(1864—1949)”。

作者简介: 刘超建(1981—),男,山东阳谷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后,主要从事历史人文地理及社会史研究。

毛拉等宗教职业者或宗教活动家,以此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光绪十年(1884年)新疆建省,鉴于持续十几年的社会动乱,清政府认识到在民族地区设置汉语教育的必要性与重要性。新疆收复后,针对当时的善后事宜,左宗棠提出了“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的七大措施,并认为“设学塾,训缠童,为潜移默化之计”,便饬令南疆各善后局、防营“广设义塾,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2]卷53}招收穆斯林子弟入塾读书,讲授“《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2]卷56}。刘锦棠则更为明确,认为“缠俗榛狁,风气未开,公家不惜巨资设立义学……不负缠民向化之心;建置行省,欲使殊方异族同我华风,诚非泽以诗书不能为力。”^[3]刘锦棠任新疆巡抚后,继续推行左公所倡导的教育政策,“广选儒师,分设义学,”^{[4]卷5}并令“各厅、州、县延师训课,讲授《小学》《孝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易》《春秋》”等,^{[4]卷3}强化儒学教育。经过左、刘二公近二十余年的大力推行义塾教育,哈密、吐鲁番、喀库、库车、阿克苏、乌什、英吉沙尔、叶尔羌、喀什噶尔、和阗及北疆地区的巴里坤、奇台、吉木萨尔、阜康、迪化、昌吉、绥来、呼图壁等地区,共设义塾达77所。^{[4]卷5}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刘襄勤公锦棠掷巨款,开义塾二十年,榛狁如故。”^{[5]卷38}尽管如此,通过义塾也培养了一批懂汉语的民族人士,为近代化教育的开办奠定了良好基础。清末推行新政,鉴于义塾的实际情况,或改或裁,发展了二十余年的义塾走到了历史尽头。

二、学生就业问题

左宗棠与刘锦棠在新疆积极推行义塾期间,尽管为学龄儿童入学接受教育提供了种种优惠政策,如义塾学生的各种费用,均由政府供应,甚至学生还可以领取若干津贴,“每塾塾童十五六至二十名不等,所有各塾童应需书籍,均由后路各台局购运散发,所需纸、笔、墨、砚,均由各

城局就地按照时价购发应用。”^{[4]卷11}甚至为了鼓励家长对学童入塾读书的支持,政府对于“南疆义学回童,皆按名给以钱米,随时考察,奖赏取作佾生,以示鼓励。”^{[5]卷103}但入塾读书仍然受到了抵制,甚至“视学堂如桎梏,相率逃避。”^{[6]甲集上}关于对义塾的抵制,除了宗教、文化等方面原因外,最主要的就是政府并没有解决他们接受教育后的学生就业问题。正如杨增新所分析的那样,各民族学童“读汉书者,永无进身之阶,非徒无益而反有害,谁肯疲敝精力以读此宗教不同之书哉!”^{[6]甲集上}这是导致在新疆地区推行汉语教育最主要的症结所在。针对此问题,刘锦棠在推广义塾教育之前,也曾以禄位为导向,来调动各民族学童入塾读书的积极性。提出了“准予各厅、州、县每年举行以此考试,对于能诵习一经,熟谙汉语者,不论人数多寡,均送该管道衙门覆试,合格即由边疆大员援照保举武弁之例,咨部给予生监顶戴。待其年已长大,即准充当头目。如有勤学不倦,能多习一经或数经者,无论已未充当头目,均准各厅、州、县考送,由道覆试请奖,再行递换五品以下各项顶戴”的建议。但遗憾的是,刘锦棠在新疆推行的一整套义塾教育的重要措施之一——解决学生的就业问题,却被清政府以“诵习一经,熟谙汉语者,则给予生监顶戴,与案例不符”^{[4]卷3}为由而予以拒绝。尽管刘锦棠通过其他途径,试图调动学童入塾读书的积极性,但他们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自愿入塾接受儒家教育者不甚踊跃。最为重要的是,虽然地方政府通过各种优惠政策,鼓励与支持学龄儿童进入义塾接受教育,但宗教上层人物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并不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与响应,“至于回教经典所用文字,均为阿拉伯文,与现行新疆境内之文字语言,颇多不同之处。而抱残守缺之阿洪(訇),唯恐义学宗教一旦改良,不利于己,故常以压迫学童学习阿文为能事。”^{[7]291}甚至到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还有阿訇、毛拉等宗教人士抵制新式教育的事件不断发生。如鲁番阿訇吐尔逊撕毁招生布告,阻扰其他学生入校行为即遭到官府羁押。经过其他阿訇作保而得以外出,但被剥夺了宗教职务。

兹因维文会报告,吐鲁番吐尔逊不令学生

上学，并阻扰他家学生使不上学，并撕毁招生布告，因之被押。兹由阿洪等具保，使吐尔逊出外谋生，以后再不阻扰教育。如有违反，惟保人是问，所具保结是实。

保人：尼牙子阿洪、散都拉阿洪、买买提尼牙子。被保人：吐尔逊。^[8]

清末新政，为新疆普遍推行近代化教育提供了契机。据《新疆图志》记载统计，全疆共设立小学学堂与简易识字学堂共595所，其中北疆地区为163所，南疆地区（包括哈密与吐鲁番）为432所。^{[5]卷39}虽然南疆地区学堂众多，但招生却相对较为困难，造成了“南路则款易集而招童难，北路汉人稍多，招生稍易而每苦于款绌”^{[5]卷38}的情况，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并没有解决好学生毕业后的就业问题。他们接受教育后，不能参与科举考试，即使参加科举考试的回族考生，所占比例也是很低的。如昌吉县自光绪四年至三十一年（1878年—1905年）科举废除，共得生员八十余名，中举者十四人，其中少数民族中取得秀才资格的生员只有“回籍”两人。儒家教育都是汉文，至于维（吾尔）、哈（萨克）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教育没有所闻。^{[9]35}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他们对儒家教育的抵触情绪，反而，他们更倾向于经文教育。

清末民初，政治转型，新疆进入了军阀统治时代。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成为近代新疆三个主要的军阀，他们治理新疆的功绩姑且不论，但其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坚持民族平等（至少名义上是这样）。且盛世才特别重视民族教育的发展，并为此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吉木萨尔县，为了改变民不知学，大量学龄儿童辍学情况，县政府成立了劝学委员会、劝学所、学务监督、董事会等组织，他们深入各乡村民户，以劝谕、鼓励与奖励的方式，引导各民族学龄儿童入学接受教育。^[10]与此同时，政治上的变革也为民族教育发展提供了契机。政府大力培训少数民族干部，在政府部门中有一定比例的民族人士充任工作人员，甚至担任了领导岗位，且加强了对少数民族干部国语培训工作。“因本省地处边陲，民族复杂，除汉族外，其他各族均不通汉语”，针对这种情况，“初级班学员，以各县政府选送之农官、

乡约，经考试及格录取之。对于高级班学员毕业经检定后，以县长或县佐治人员任用。初级班成绩优良者，分派任各县区区长。针对蒙（古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等居住区的千户长、百户长、各级伯克等基层管理人员，一方面组织培训，另一方面也要根据政治水准及文化教育程度，实行民选制。”^[11]对于边疆地区的民族学生，概受国家特殊待遇，“毕业后，自应回籍服务，政府当视其学问、能力分别予以适当之安插。专科学校以上学校毕业生，应优先给予相当职务。中等学校毕业，其不升学者，即委充地方村长、保长或赴文化机关及生产机关服务；小学毕业，其不升学者，则斟酌情形送入工厂或其他职业机关，学习生产技能，以资改良或发展生产事业。”^[12]政治地位的提高与毕业后的优厚待遇，对于民族学生与家长来说，有着较大的吸引力。因此，对于传统经文教育具有较大冲击，为学龄儿童走出封闭的教育世界解除了重要的制约瓶颈。

三、校址的选择——与清真寺的分离

新疆改建行省以前，民族学童接受的是传统经文教育，教育权被宗教人士所垄断。经堂设置在清真寺，由“三掌教”，即伊玛目、穆安津、海推布管理。后来改为阿訇聘请制代替掌教世袭制，统交阿訇管理。其任务一是传授伊斯兰教的经典、教义、教规、教律和宗教仪式；二是培养伊斯兰教的接班人，诸如各级阿訇、毛拉等宗教职业者和宗教活动家。^{[1]137}改建行省以后，刘锦棠极力推行义塾教育，除有“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13]259}的目的之外，也有试图实现教育与宗教分离的想法。清末新政期间，在南疆地区设置的432所学堂中，其校址多借用民房、官房或汉族庙宇中，逐步实现校址与清真寺的分离。根据《新疆图志》统计，就校址选择问题，以乌鲁木齐与喀什两个地区做一对比（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喀什地区的学堂数量远多于乌鲁木齐地区，主要是南疆地区经过数次社会动乱，清政府认识到在南疆发展儒家教育的重要性及必要性。不仅学堂数量较多，而且校址也多是租赁民房或借用官房和汉族庙宇。即是说，举办儒家教育，要实行学校与宗教的逐渐分离，首

先校址选择不能在清真寺，这有利于减少宗教对教育的影响。除《新疆图志》中明确记载喀什地区的 31 所学堂选择在民房外，还有借用官房（县署、驿房等）的记载。笔者在南疆地区考察

时，据当地老人回忆，清末民国学堂多是在民房、庙宇或官房中上课，也有在清真寺的，但数量相当稀少。

表 1 清末乌鲁木齐与喀什地区学堂设立情况对比

区域	县府名	城乡分布		学堂建立性质或地点						
		城内	乡村	改建	营房	民房	劝学所	祠庙	清真寺	不详
乌鲁木齐地区	迪化县	12	13	6	3	3	3	5		5
	昌吉县	3	2	4				1		
	呼图壁县	2	4	6						
	阜康县	2	5	3	1			1	1 ①	1
	孚远县	2	3	2				2		1
	奇台县	10	3	5		1		7		
	绥来县	7	8	2				11		2
合计		38	38	28	4	4	3	27	1	9
喀什地区	疏勒府	9	9	12		3	1			2
	疏附县	7	16	14			1		1 ②	7
	伽师县	6	12	18						
	英吉沙尔县	6	7	12						1
	莎车府	15 ③	34	48						1
	巴楚州	6	13	19						
	叶城县	11	23	3		28	3			
合计		60	114	126		31	5	0	1	11

注：资料来源于〔清〕袁大化、王树枏等：《新疆图志》卷 39，民国十二年（1923 年）东方学会本。

四、课程的设置与宗教人士教育理念的转变

新疆地区传统的经文教育没有固定教材，大多采取口耳相传、手抄的方法，以诵读各种《藏经》《古兰经》与《圣训》为授课的内容，以传授宗教礼仪、风俗习尚为宗旨。“喇嘛教之势力仍左右蒙古人之生活方式，掌握蒙古人之文化事业。可爱六七龄之学童，仍然一批一批地送入召庙。不问其是否愿意接受喇嘛教之教育，从此只知朗诵藏经，礼拜仪式，但无需明其意义。而回教寺院亦同样的掌握伊斯兰教经学教育，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等各族宗教之生活。诸凡诵经布道，婚

丧大礼以及排难解争，稽迷执疑，仍具有极大之社会势力。所设各私立学校，仍然是以宣传宗教、礼拜神祇为中心课程。倘遇有疾病、瘟疫之流行，率皆请毛拉作法或阿洪诵经，甚少从事科学之治疗。”^{〔7〕311}清末及杨增新、金树仁主政新疆期间，学校多为宗教人士主办或民族头目募集资金兴办，政府对此干涉较少，因此，教学内容多为宗教服务。如初级课程为七：（一）回教仪式研究；（二）阿拉伯字母；（三）可兰经后口节；（四）可兰经全文；（五）苏巴阿拉西尔；（六）鄂哇口（宗教诗）；（七）和甲哈皮斯（宗教诗）。上列七种，前四种为阿拉伯文，后五六两者为土耳其文，七项为

①阜康县东五运回族清真寺。
②为疏附县香娘娘麻扎。
③回城为 8 所，汉城为 7 所。

波斯文。七种习毕，始能毕业。教师多为宗教人士，招生授课，如内地之私塾。高级者为富家所办，规模较大，课程除穆罕默德历史及阿（拉伯）文、波斯文外，无其他科学。^{[14]282}

面对经文学校的授课内容而言，左、刘二公在推行义塾教育中，所授课内容仍以《千字文》《三字经》《孝经》《论语》等为主。杨增新认为，教民不愿读汉书的原因是学而无用，“通缠文者，无往不利易谋衣食。至通汉文之回缠，则直同废人，竭数十年之力以为学，反不如通缠文者有用。”^{[6]甲集上}末推行新政，其中扩充近代化教育是主要内容之一，因此，在教材选用上做了多方面变革。新疆虽地处西北边陲，也进行了相应改革并制订了《新疆高等学堂章程》。“中等教育中，理、化、算学等都得到了设置；高等教育中，课程设置主要有伦理、经学、中文、算学测绘、中外历史、兵学、中外舆地、英文、俄文、体操，其中英文与俄文任选一门。”^[15]1934年，盛世才扩充教育，“制订了两期三年教育计划，

其中在教材上要严格编译和使用教科书制度，各民族学校教科书必须由教育厅自行编印、审定、选购和颁发。”^[16]小学课程设置主要有政府政策、公民、国语、算术、社会、自然、卫生、劳作、美术、音乐、历史、地理和维（吾尔）文，与杨、金时期有很大不同。^[17]鉴于新疆的特殊情况，教材的使用不统一。乌鲁木齐地区“要开办一地之教育，教材之选择关系很大。故取教材时，须由该省教育厅派员，亲自到各区参查当地之各种情形，以编教材。”^{[18]243}但根深蒂固的经文教育对于近代化教育的推行仍存在着较大阻力。为了减轻这种阻力，政府采用了渐进式的推动方式。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即使在近代化学校，也开办了宗教课程。一周安排三到四次，由阿訇或毛拉或经文助教讲授。^{[9]36}并在各民族学校内，配置了经文助教，至1938年，昌吉县共建立了民族小学6所，在校生为344人。教员11人，经文助教3人，学校设立情况列为表2。

表2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期昌吉县民族小学统计

校名	族别	班数/个	学生人数/人	教师/人			备注
				教员	经文助教	小计	
初级一小	维吾尔	3	80	3	1	4	后设高小
初级二小	回	3	114	3	1	4	后设高小
河州工初小	回	2	62	2	1	3	
庙儿沟初小	哈萨克	1	27	1		1	
努尔加初小	哈萨克	1	30	1		1	
金涝坝初小	哈萨克	1	31	1		1	
合计			344	11	3	14	

注：资料来源于仲启明：《昌吉民族教育的今夕》，《昌吉市文史资料》第4辑，1992年，第36页。

这不仅解除了学龄儿童父母的顾虑，而且一些民族文化与宗教人士也深入到学龄儿童家中，劝导他们入学。宗教人士教育理念的转变，以及凭借他们在民众中的影响，是近代化教育在各民族学童中能够得到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甚至有的阿訇会同本村管理人员，为发展本村教育、扫除文盲，向政府申请建立近代化学校。

案据：昌吉县属游牧区二道水村长而得旦什、乌斯满希、克帕藏根等二百二十二家呈

称。为发展该村文化，扫除文盲，计拟在该村设立小学一处。关于建筑学校，一切费款，由应缴之扎尔提乌（吾）受尔作为建筑费是否可行，祈示遵等情。文化会当经派员调查，属实准予照办。惟因成立后，该收费筹划困难，难以进行，拟请归为县立主办。如不能时，可以暂归敝会指导办理。相应函请查照，希即复为荷，此致。

昌吉县政府：委员长：马哈木根 副委员

长：阿仁^[19]

总之，盛世才主政新疆期间，通过各种灵活的教育政策，在毕业生就业安置、教材选用以及近代化教育中经文课程的讲授等，基本解决了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转变的制约瓶颈，使得近代化教育在新疆地区获得快速发展。1942年全疆地区共有在校学生为274 976人，其中民族学生为250 726人，^{[14]283-284}约占91.2%。

五、师资培训：由阿訇垄断转向专职训练

新疆建省以前，传统的经文教育完全被宗教人士垄断，阿訇、毛拉不但承担教育管理，而且也是教师的主要承担者。因此，在经学教育向近代化教育转变的过程中，师资培训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左宗棠与刘锦棠在大力推行义塾教育的过程中，之所以没有取得预期效果，与师资有很大的关系。一是教师没有经过专门培训，他们不懂民族语言，而学生不懂汉语，师生之间难以沟通；二是教师不了解经文教育的授课情况，不能根据民族学生的实际状况灵活授课。因此，虽然重赏延请教师，月薪达六七十两，^{[13]259}但学童对授课内容仍“茫然不知所谓，愈益厌苦之。”^{[5]卷38}

清末新政期间，于南疆地区建立了432所学堂，教师也“选调缠生昔日曾入义塾者”^{[5]卷38}充任。因为政治鼎革，后继者并没有将这一政策继承，致使未取得较好的效果。地方官员大多将兴办学堂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并没有设立相应的配套教育体制，只追求学堂数量。当他们升迁或离任后，学堂大多处于濒临倒闭的状态，所以并没有达到推广儒家教育的目的。以致在民国建立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学童仍旧接受经学教育者居多，即使在乌鲁木齐地区亦是如此。如1923年呼图壁县南山石梯子哈（萨克）族群众办有私学一所，即延请当地阿訇授课；1936年，赵冠民任呼图壁县县长，对少数民族文化教育极为重视，建立维吾尔族学校1所。起初没有合适的教师，授课不得不延请阿訇承担。^{[20]111-113}昌吉南山牧区，哈（萨克）族部落头目、维（吾尔）族毛拉举办了几处伊斯兰教经文学校，入学的为本部落青少年儿童约15人。聘请了一个名字叫沙立的毛拉任教，他教经文又教哈（萨克）文。^{[9]32-33}

盛世才对教育的发展增加了投入，通过多种途径强化了对民族教师的培训。如建立师范学校、简易师范班、教师训练班、师范专科班等形式，以解决民族教育师资缺乏的情况。“义务教育之设立，各县之大村镇中，应设义务小学，由县内之教育最高机关派员到农村中，调查其生活情形，并记录之。立一标准，布示各村，命其自己报名入义务小学，师资用已训练者以充之。”^{[18]245}同时，除各地教材不同之外，因语言、风俗的不同，所以对训练师资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A. 能通回、汉语言及明白回、汉之风俗习惯者；B. 能耐劳苦者；C. 信仰三民主义者。择定之后，将其召集附近之城市中，再加以相当之训练，后乃派往各地，以做各种教育事业。”^{[18]242}经过多种方式教师培训，师资缺乏的状况虽有所改观，但仍不能满足教育快速发展的需要。

汉回则仍遵守其一贯之守旧习惯，不令其子女就学，其他各族的已近学龄儿童不送学校者，依然多数。以致国语不得畅行，即维（吾尔）文亦不能认识。文盲之多，诚可警人，因此能接受较高教育之人，为数寥寥。即以号称本省文化中心之迪化省会而论，设有高级中学一所，学院二处，已感招生困难，故行政干部人员，与各级学校师资，异常缺乏。^{[7]311-312}

政府一方面面对教师缺乏的困境，另一方面还存在宗教人士在教育上的影响，如何将二者之间的关系协调好，将是近代化教育在新疆学童中发展好的关键。由此，政府并没有急于剥夺阿訇、毛拉的教师地位，而是首先对他们进行培训，以此逐步实现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转变。也就是说，政府面对传统的经学教育存在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将阿訇、喇嘛、毛拉等宗教上层由政府给予一年以上的国语培训，要求他们用国语进行授课。除了讲授经文外，还增加了自然、算学、史地等课程的培训。

改进边地宗教教育案，办法：分区设置训练所，集中各寺庙之喇嘛、阿訇给予一年以上之训练，使之能熟谙国之国语，明瞭国情，于结业后返回原寺庙改良教务。俾之领导教徒，此项喇嘛及阿訇得由国家酌予奖励；由中央就

各地寺庙分期设置施教站，并以曾经受训喇嘛、阿訇中之优秀分子主持之。教育部制定若干研究机关编译喇嘛及回教经典有关之课本，引用宗教经典要义、成语，配合国家政策及科学常识，以为各寺庙僧侣、经生及各级学校之补充读物，以收逐渐改进之效。在僧侣较多之中心寺院，筹设类似职工补习学校之寺僧学校，采半工半读制，招收青年僧侣入校，授以国语，藏文、公民、史地、自然、算学等课。^[12]

政府通过对喇嘛、阿訇、毛拉等宗教人士培训的同时，随着学校的大量兴办，仅仅依靠对他们的培训已远不能满足对教师的需求，如1942年全疆由政府投资设立的各级学校达580余所，在校生共有91 065人，其中民族生为68 689人，^{[14]283-284}约占75.43%；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回（族）、蒙（古族）等各民族之文化促进会、寺馆及私人所办学校1 291所，学生116 549人。^{[14]283}因此，从学生中选拔成绩优秀者，再经过简易师范班的短期培训，由政府分配各地从事任教，这是解决当时教师缺乏的主要途径。如县长赵冠民在呼图壁兴办维吾尔族小学时，由于师资缺乏，两个班只有两名教师。就从学生中选出较为优秀者到迪化参加教师培训三个月后，回到学校任教。^{[20]113}另外，政府在迪化、伊犁、阿克苏、和阗等地建立师范学校，以专门培养各级学校的教师。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新疆省师范毕业生为110名，其中民族学生为95名，汉族学生15名^[21]；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新疆省教育厅设立国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班，为伊犁、喀什、阿克苏、塔城、阿山、和阗、焉耆等区培训16班次，共676名教师^[22]。根据档案资料不完全统计，新疆省通过各种师范培训班的方式，共培养了近一万余名教师，其中，民族教师占70%以上。大量毕业于师范学校或简易师范学校的学生，充实到教学一线，也使得宗教人士逐渐退出近代化教育体系。

六、结语

自新疆改建行省至1949年期间，针对新疆传统经文教育而言，受到内外因素的冲击，使其日渐削弱。新疆改建行省之初，在左宗棠与刘锦棠的倡

议和主持下，清政府在全疆各地兴办义塾教育，由于缺乏有效的教育配套措施，并出现急功近利的情况。“前清时，中小学校同时并举，急遽无序，而各民族以宗教不同之故，不愿送子弟入学。操之过急，甚至逃入外籍以避之。”^{[6]甲集上}阿訇、毛拉、喇嘛等宗教职业者，为了维护自己在教育上的地位，也竭尽全力阻止回族学童入塾读书。可见，兴办义塾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对传统经文教育形成一次冲击，于新疆各民族中培养了一批懂汉语的人才，无疑有利于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为新疆顺利开展近代化教育奠定了良好基础。

对于新疆经文教育的第二次冲击则是20世纪初期出现的新型经文学校，其创办者多是具有革新精神的宗教学者。他们受到近代科学的影响，主张经文学校内讲授近代科学知识，并提出了教学内容的革新，以促进新疆社会的进步。新型经文学校的出现，打破了传统经文学校一统天下的局面，因此受到了守旧宗教人士的反対。^{[1]326-327}尽管如此，由于新式经文学校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潮流，已经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在各民族教育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盛世才主政新疆后，对民族教育尤为重视，成立了九个民族文化促进会，主张会办各民族教育学校，以发展民族固有之文化。历史的发展有时让人类自己也捉摸不定，民族促进会的办学宗旨与新型经文教育有较多的契合点，受到具有革新精神的宗教学者的欢迎，二者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合作，形成了对传统经文学校的第三次冲击。最为重要的是，新疆政府在学生就业、师资培训等关键环节上做出了一整套的教育配套措施，促使很多的宗教人士转变了教育理念。新疆教育发生了重大变革，由传统经文教育向近代化教育的快速转变，经过职业训练的教师逐渐代替了阿訇、毛拉等宗教职业者，教学内容也由传统的宗教教义被近代科学知识所代替，这种变革为各民族教育近代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但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水平，还将封闭的经文教育打开缺口，为他们走出封闭的教育世界提供了历史机遇。

〔参考文献〕

- [1] 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编写组：中国新疆地区伊斯兰教史[M]．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

- [2] 左宗棠. 左文襄公全集·奏稿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96.
- [3]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清代新疆档案选辑: 第29册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 [4] 刘锦棠. 刘襄勤公奏稿 [M]. 台北: 文海出版社, 1968.
- [5] 袁大化, 王树枏. 新疆图志 [M]. 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铅印本. [出版地不详]: 民国十二年东方学会, 1923 (民国十二年).
- [6] 杨增新. 补过斋文牍 [M] //杨建新. 西北史地文献卷: 第4册.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1990.
- [7] 陈希豪. 新疆史地及社会 [M] //新疆史志: 第2部第6册.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0.
- [8] 关于吐尔逊于撕毁招生布告由所出的切结 [A]. 昌吉: 昌吉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J1-3-58-3.
- [9] 仲启明. 昌吉民族教育的今夕 [G] //昌吉市文史资料: 第4辑.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92.
- [10] 朱建明. 吉木萨尔县教育发展概况 [G] //北庭文史: 第17辑.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2007: 119.
- [11] 新疆省社教人员训练班实施情形 [A].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5-11381.
- [12] 中国教育年鉴有关边疆 (新疆) 教育委员会情况的文稿 [A].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5-1769.
- [13] 秦翰才. 左文襄公在西北 [M]. 长沙: 岳麓书社, 1984.
- [14] 李寰. 新疆研究 [M] //新疆史志: 第3部第13册.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0.
- [15] 新疆高等学堂章程 [M] //马文华. 新疆教育史稿. 乌鲁木齐: 新疆教育出版社, 2006.
- [16] 马文华. 新疆教育史稿 [M]. 乌鲁木齐: 新疆教育出版社, 2006.
- [17] 刘超建. 1821—1949年间乌鲁木齐教育与社会互动关系研究 [J].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2016 (3): 73-82.
- [18] 杨刚毅. 新疆问题讲话 [M] //新疆史志: 第3部第12册. 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2000.
- [19] 新疆哈柯文化促进会扫除文盲请函 [A]. 昌吉: 昌吉市档案馆藏, 档案号: J1-3-58-41.
- [20] 夏木斯, 徐从禄. 我经历的维族教育发展史 [G] //呼图壁文史资料: 第5辑. [出版地不详]: [出版者不详], 1989.
- [21] 新疆省师范毕业生分配服务处所报告表 [A].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5-9681.
- [22] 新疆省政府教育厅三十三年办理国民教育师资短期训练班概况表 [A]. 南京: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档案号: 5-11092.

